

# 数字贸易与共同富裕：来自省域层面的证据

赵桑林<sup>1</sup>, 李哲彤<sup>2</sup>, 邓浩<sup>1</sup>, 周志远<sup>3</sup>, 游星<sup>4</sup>, 佟嘉昂<sup>5,6</sup>

(1.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工程管理学院, 长沙 410205; 2.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长沙 410205;  
3. 莫斯科国立大学, 莫斯科 119991; 4.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经济学院, 长沙 410205;  
5.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6.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香港 999077)

**摘要:** 返乡创业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之一。农村数字贸易的兴起为返乡创业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先前经验、经济资源和创业机会,能有效带动返乡创业的成功开展。农村经济的自发式增长,为农村经济注入更多的创新活力。数字贸易能够通过联结城乡创业渠道、融合城乡创业资源以及打通城乡创业市场,实现城乡在渠道、资源和市场的共同富裕,从而缩小城乡间的贫富差距。建议通过完善农村返乡创业相关的法制法规、推进农村返乡创业者的职业培训、鼓励返乡创业者的跨部门合作来加强数字贸易对返乡创业活动的推动作用,从而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 数字贸易; 返乡创业; 共同富裕; 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5)03-0284-09

推动共同富裕是坚持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增强国家凝聚力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必由之路<sup>[1]</sup>,要求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缩小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的程度<sup>[2-3]</sup>。“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已经成为分阶段实现全体共同服务的重要目标,使得新阶段下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包容的时代特征。其中,由于经济发展的历史遗留原因,城乡二元对立的发展战略使得城乡间的经济差距日益显著<sup>[4-5]</sup>,使得乡村大量适龄劳动力流失、乡村社会资源闲置、乡村产业链落后,呈现出日益凋敝的社会面貌<sup>[6]</sup>,因而乡村振兴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sup>[7]</sup>。

然而,数字技术改变了当前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给经济生产交易创造了更便利的环境和创新创造氛围。其中,数字贸易作为建立在互联网平台技术上产生的新型经济方式,能够有效打破城乡间的信息不对称,缩短城乡在地理区位上的差距,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sup>[8]</sup>。其中,数字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大量创业活动,给城乡现代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创新动力,是未来经济发

展的重要活动形式,也是振兴乡村的重要环节。

信息革命以来,数字技术已经给人类经济生产生活带来了重大的突破,推动了经济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的显著提升,使得贸易活动能够在更广阔的区域进行并发挥更重要的影响力。自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在全球普及以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关注到数字技术带来的贸易蓬勃发展并展开了相关研究。当前,已有研究分别从数字贸易的概念及定义、数字贸易的优势、数字贸易存在的弊端等角度展开了对数字技术与贸易的探讨。在数字贸易的概念方面,蓝庆新和窦凯<sup>[9]</sup>、马述忠和潘钢健<sup>[10]</sup>通过对贸易、数字产品、数字技术等定义的探讨,指出数字贸易既可以是由数字技术完成的产品贸易,也可以是围绕数字产品与数字产业展开的贸易。在数字贸易的优势方面,首先有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构建网络虚拟空间来降低贸易成本,从而帮助更多中小微企业和创业者能够参与到产业链的构建中,使不同类型的经济体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当前关于数字贸易优势与挑战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普遍认为数字贸易能够通过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高公平性来推动整体经济环境的

**收稿日期:** 2024-09-03

**基金项目:**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D202412090842590153);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S202411532001)

**作者简介:** 赵桑林(2003—),男,湖南娄底人,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与工程;李哲彤(2005—),男,湖南郴州人,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邓浩(2004—),男,湖南耒阳人,研究方向为工程造价;周志远(2001—),男,安徽黄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商业分析与金融;游星(2003—),男,湖南娄底人,研究方向为经济学;佟嘉昂(2002—),男,辽宁沈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精算。

改善,但同时也会存在技术垄断、运营成本增高、制度不完善、信息安全等现实问题,给数字贸易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由此可见,数字贸易能够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均衡发展、加速社会资源流入农村市场,以及给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推动农村的进一步发展,为农村产业优化升级与农户收入增加提供一定的帮助,进而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

## 1 变量与数据

### 1.1 数据来源

实证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Wind 和 CNRDS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数据库,选取 2011—2023 年 30 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为了使研究结果能够更加真实客观,在筛选样本时,借鉴已有研究<sup>[11]</sup>的处理方法:①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②采取缩尾的方式处理全部连续变量,分位数标准设为 1%和 99%;③对所涉及的变量中为绝对量的指标数据做对数化处理。最终选取了 330 个样本。

### 1.2 变量设定

#### 1.2.1 被解释变量:数字贸易(DT)

数字贸易是指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进行跨

境贸易的过程,涉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数据流动和数字化的商业活动。具体从基础设施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数字贸易能力以及贸易潜力 4 大维度使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具体评价指标见表 1。

#### 1.2.2 解释变量:共同富裕(Rich)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韩亮亮等<sup>[12]</sup>的做法,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常住人口数、常住人口数、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以及城镇化率 7 大维度使用主成分法进行降维测算共同富裕指数,在稳健性方面,使用熵值法对其进行测算验证。共同富裕评价指标见表 2。

表 2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

指标	指标来源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国统计年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国统计年鉴
城镇常住人口数	中国统计年鉴
常住人口数	中国统计年鉴
基尼系数	地区基尼系数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化率	城镇常住人口数/常住人口数

表 1 数字贸易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指标方向
基础设施环境	网络基础环境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万个	正向
		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正向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km	正向
		域名数	个	正向
		移动互联网用户	万户	正向
	物流运输环境	交通运营能力指数	%	正向
		公路营运载货汽车拥有量	万辆	正向
物流运输从业人员		万人	正向	
技术创新环境	科技投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	万元	正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	万人年	正向
	科技产出	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	万个	正向
		技术市场成交额	万元	正向
数字贸易能力	数字产业化贸易	电信业务总量	万件	正向
		软件业务收入	万元	正向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万元	正向
	产业数字化贸易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	万个	正向
		电子商务销售额	万元	正向
		电子商务采购额	万元	正向
贸易潜力	对外开放水平	贸易开放度	%	正向
	居民消费潜力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万元	正向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正向
		人均 GDP	万元	正向

注:交通运营能力指数=(各省份铁路营业里程/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各省份内河航道里程/全国内河航道总里程+各省份公路里程/全国公路总里程)/(各省份领土面积/全国陆地领土面积);物流运输从业人员=铁路、道路、水上、航空运输业职业工人数;贸易开放度=各省份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GDP。

### 1.2.3 中介变量:就业与创新

从就业与创新两个维度进行数字贸易与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就业方面,使用创业活跃度(BAU)、失业状况(UNE)来衡量。在创业维度、创业活跃度方面,参考白俊红等<sup>[13]</sup>、周小虎等<sup>[14]</sup>的研究,在逐步回归法中主要采用人口法,即将省级人口作为标准化基数,以省级每百人中新创企业数作为创业活跃度的测度指标。相较于以企业数量作为标准化基数的方法,人口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区域内企业规模同质性而产生的度量偏误问题。失业状况方面,用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衡量。

从创新角度,地区创新水平是指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该地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表现水平。将创新水平与研发强度两个维度作为衡量指标。创新水平统计口径为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取自然对数;研发强度方面统计口径为研究经费内部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 1.2.4 控制变量

参考前人方法选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①外商直接投资(FDI),统计口径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地区生产总值;②政府干预程度(Gov),统计口径为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③社会消费水平(SCL),统计口径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④人口密度(PoP),统计口径为地区总人口数/地区行政区划面积;⑤劳动力水平(Labor),统计口径为就业人员数取自然对数。

主要变量定义见表 3。

## 2 计量模型构建

### 2.1 基础估计模型

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及 Wind 数据库附注中收集了所有上述变量。为了检验本研究的主假设,即研究假设 H1,在实证估计的过程中选用以下模型。由于异方差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为避免该情况,引入了稳健标准误进行调整。具体模型为

$$DT_{i,t} = \alpha_0 + \alpha_1 Rich_{i,t} + \sum \alpha_x Control_{i,t} + \sum Code + \sum Year + \epsilon_{i,t} \quad (1)$$

式中:Controls 为控制变量合集; $\alpha_0$  为常数项; $\alpha_1$ 、 $\alpha_x$  为回归系数; $\epsilon_{i,t}$  为残差项,满足正态分布;Code 为个体固定效应;Year 为年度固定效应,在研究过程中对个体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以提高结论的可靠性。

### 2.2 中介变量模型

为了检验数字贸易对共同富裕影响的中介机制,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sup>[15]</sup>的方法,使用“逐步回归法”对中介变量(Media)进行估计。具体将创业活跃度(BAU)、失业状况(UNE)、创新水平(Inv)与研发强度(RD)作为中介变量,对基准回归进行检验,并构建相应的研究模型:

$$Media_{i,t} = \beta_0 + \beta_1 DT_{i,t} + \sum \beta_x Control_{i,t} + \sum Code + \sum Year + \epsilon_{i,t} \quad (2)$$

表 3 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变量来源
被解释变量	数字贸易(DT)	基础设施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数字贸易能力以及贸易潜力 4 大维度使用熵值法进行测算	Wind 和 CNRDS(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数据库
解释变量	共同富裕(Rich)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常住人口数、常住人口数、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以及城镇化率 7 大维度使用主成分法进行降维测算共同富裕指数	Wind 数据库、中经数据
中介变量	创业活跃度(BAU)	省级人口作为标准化基数,以省级每百人中新创企业数作为创业活跃度的测度指标	Wind 数据库、中经数据
	失业状况(UNE)	城镇登记失业率	
	创新水平(Inv)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取自然对数	CNRDS 数据库、中经数据
	研发强度(RD)	RD 经费内部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CNRDS 数据库、中经数据
控制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地区生产总值	国家统计局
	政府干预程度(Gov)	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社会消费水平(SCL)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人口密度(PoP)	地区总人口数/地区行政区划面积	
	劳动力水平(Labor)	就业人员数取自然对数	
	年份(Year)	观测值处于当年,Year 取 1,否则取 0,以 2015 年为基期	
	地区(Code)	样本所在地区,Code 取 1,否则取 0	

$$\text{Rich}_{i,t} = \delta_0 + \delta_1 \text{DT}_{i,t} + \delta_2 \text{Media}_{i,t} + \sum \delta_x \text{Control}_{i,t} + \sum \text{Code} + \sum \text{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3)$$

式中:  $\beta_0, \delta_0$  为常数项;  $\beta_1, \beta_x, \delta_1, \delta_2, \delta_x$  为回归系数。当系数  $\beta_1, \delta_2$  均显著, 则说明中介变量发挥了中介作用; 当  $\delta_1$  显著时, 说明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 反之则为完全中介效应。

###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4。

从统计结果看, 被解释变量方面, 数字贸易 (DT) 的平均值为 0.156, 标准差为 0.114。核心解释变量方面, 共同富裕 (Rich) 的平均值为 -0.010, 标准差为 0.323, 最大值为 0.795, 最小值为 -0.752, 说明在各省级之间共同富裕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变量方面, 创业活跃度 (BAU) 的平均

值为 0.853, 标准差为 0.140; 失业状况 (UNE) 的平均值为 0.032, 标准差为 0.006, 说明地区间就业情况不容乐观。在创新方面, 创新水平 (Inv) 平均数为 9.618, 标准差为 1.382, 研发强度 (RD) 平均数为 0.017, 标准差为 0.011, 说明地区之间对于创新也存在差异。

### 4 相关性检验

使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法检验数字贸易与共同富裕之间的相关关系, 同时对模型中的主要变量进行分析。Pearson 相关系数见表 5。数字贸易 (DT) 与共同富裕 (Rich) 相关系数均为正数, 且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明数字贸易 (DT) 与共同富裕 (Rich) 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这也为下文的计量回归检验奠定了基础。

表 4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p25	p50	p75	最大值
DT	330	0.156	0.114	0.019	0.079 0	0.141	0.160	0.646
Rich	330	-0.010	0.323	-0.752	-0.249	0.004	0.197	0.795
BAU	330	0.853	0.140	0.614	0.731	0.851	0.973	1.089
UNE	330	0.032	0.006	0.013	0.029	0.033	0.036	0.045
Inv	330	9.618	1.382	6.254	8.663	9.678	10.610	12.220
RD	330	0.017	0.011	0.005	0.009	0.014	0.022	0.062
FDI	330	0.019	0.015	0.000	0.007	0.017	0.026	0.073
Gov	330	0.249	0.102	0.119	0.181	0.226	0.290	0.612
SCL	330	0.380	0.068	0.227	0.337	0.384	0.420	0.526
PoP	330	5.472	1.290	2.076	4.920	5.680	6.351	8.270
Labor	330	7.607	0.765	5.739	7.203	7.672	8.226	8.848

表 5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

变量	DT	Rich	BAU	UNE	Inv	RD	FDI
DT	1						
Rich	0.360***	1					
BAU	0.164***	0.259***	1				
UNE	-0.256***	-0.107*	-0.166***	1			
Inv	0.699***	0.414***	0.288***	-0.182***	1		
RD	0.662***	0.493***	0.161***	-0.317***	0.715***	1	
FDI	0.233***	0.388***	-0.215***	-0.0520	0.351***	0.448***	1
Gov	-0.513***	-0.394***	0.0570	-0.0750	-0.712***	-0.435***	-0.435***
SCL	0.245***	0.00700	0.152***	-0.171***	0.510***	0.330***	0.126**
PoP	0.547***	0.412***	0.0190	-0.098*	0.731***	0.686***	0.591***
Labor	0.457***	0.0290	-0.0170	0.0390	0.679***	0.142**	0.123**
变量	Gov	SCL	PoP	Labor			
Gov	1						
SCL	-0.307***	1					
PoP	-0.724***	0.434***	1				
Labor	-0.701***	0.422***	0.418***	1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 \*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水平。

##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1 基准回归估计

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与地区固定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6。不添加控制变量时,数字贸易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当添加控制变量后,数字贸易与共同富裕之间仍存在显著正相关,且在 1%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 0.785。拟合优度从 0.13 上升至了 0.353。说明模型解释程度较好,控制变量选择合适。综上可知数字贸易能够推动共同富裕。数字贸易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数字贸易促进了全球市场的扩大和连接,为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机会。这种跨境贸易的增加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其次,数字贸易提供了一个更便捷和广阔的平台,使得创新和创业更加容易。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通过数字贸易的推动,新的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可以更快地涌现出来,为经济发展和就业创造更多机会。最后,数字贸易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市场。这为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促进了经济均衡发展,缩小了贫富差距。

表 6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不添加控制变量	添加控制变量
	Rich	Rich
DT	1.022*** (8.407)	0.785*** (5.442)
FDI		3.441*** (3.062)
Gov		-1.631*** (-6.157)
SCL		-0.232 (-0.906)
PoP		0.00262 (0.123)
Labor		-0.194*** (-6.817)
常数项	-0.169*** (-6.318)	1.761*** (6.031)
样本数	330	330
R <sup>2</sup>	0.130	0.353
Code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F	70.68	26.35

注:括号内为 *t* 值;\*\*\*表示 1%的显著水平。

### 5.2 内生性问题

样本自选择偏误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本研究回归样本并不是“随机”选择的,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偏误和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遗漏变量在研究中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先采用工具变量解决自选择偏误和遗漏变量的问题。

借鉴肖梦瑶和韦琳<sup>[16]</sup>的做法,选取以各城市在 1984 年每百万人邮局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并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如下:以各城市在 1984 年每百万人邮局数量和数字贸易发展有很大相关性。此外,各城市在 1984 年每百万人邮局数量与共同富裕并无直接关系。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从互联网发展角度出发,对模型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采用的回归方法是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表 7 展示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 7 中列(1)展示了第 1 阶段回归结果,1984 年每百万人邮局数量(IV\_1984)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1984 年每百万人邮局数量会影响当期数字贸易,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根据列(2)的结果,数字贸易(DT)的回归系数为 2.057,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贸易(DT)依然可以促进共同富裕。在使用 2SLS 进行回归后,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果,这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

表 7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1)	(2)
	第 1 阶段	第 2 阶段
	DT	Rich
IV_1984	0.131*** (6.329)	
DT		2.057*** (3.938)
FDI	-0.841** (-2.037)	4.452*** (3.120)
Gov	0.005 03 (0.055)	-1.617*** (-5.351)
SCL	-0.183** (-2.169)	-0.038 (-0.133)
PoP	0.029*** (4.082)	-0.056* (-1.733)
Labor	0.070 8*** (6.597)	-0.248*** (-6.360)
常数项	-0.506*** (-4.969)	2.195*** (5.918)
样本数	330	330
R <sup>2</sup>	0.442	0.227
Wald	43.56***	
F Test	72.26	
Code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水平。

### 5.3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利用主成分法求得的数字贸易变量综合得分,采用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表8展示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DT\_W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总的来说,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数字贸易发展依然能够促进共同富裕,并且控制变量的符号也未发生改变。验证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考虑到数字贸易影响共同富裕可能存在时滞性问题,对数字贸易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再做回归。列(2)为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发现数字贸易滞后一期与共同富裕之间仍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模型稳健。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Rich	Rich
DT_W	1.336*** (9.210)	
L_DT		0.715*** (4.320)
FDI	4.521*** (4.368)	4.128*** (3.524)
Gov	-1.824*** (-7.281)	-1.741*** (-6.562)
SCL	-0.240 (-0.996)	-0.351 (-1.325)
PoP	-0.044** (-2.202)	0.003 (0.161)
Labor	-0.179*** (-6.933)	-0.193*** (-6.398)
常数项	1.892*** (7.020)	1.839*** (6.408)
样本数	330	300
R <sup>2</sup>	0.438	0.365
Code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F	40.08	25.09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1%、5%的显著水平。

## 6 进一步分析

为了检验本研究的机制假设,本研究从就业与创新两个维度入手并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估计。

### 6.1 作用机制检验

表9为就业维度的回归结果,列(1)、列(2)为创业活跃度的情况。由列(1)可知数字贸易与创业活跃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贸易能够提高创业活跃度。由列(2)可知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综上所述说明数字贸易能够提高创业活跃度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数字贸易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创业者可

以通过数字平台推广和销售创新的产品或服务,凭借独特的创意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在市场上脱颖而出。这不仅可以带来商业成功,还能够促进创新的发展,并为共同富裕创造更多机会。

失业状况方面,由表9中列(3)可知,数字贸易与失业状况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说明数字贸易能够降低城镇登记失业率;由表9中列(4)可知,失业状况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综上所述可知数字贸易能够缓解失业状况问题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多的技术和数字化能力。数字贸易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学习和培训的机会,使他们能够适应数字时代的需求。政府和企业可以提供相关的技能培训和转型支持,帮助失业人员转变职业方向,提升就业能力,实现共同富裕。

除了就业方面,数字贸易也会带来地区创新。表10中列(1)、列(2)为创新强度的情况。由列(1)可知数字贸易与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由列(2)可知创新能力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综上所述可知数字贸易能够提升创新能力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数字贸易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机会。通过数字平台,企业可以进行线上

表9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1(就业)

变量	创业活跃度		失业状况	
	(1)	(2)	(3)	(4)
	BAU	Rich	UNE	Rich
BAU		0.743*** (7.160)		
UNE				-0.034* (-1.835)
DT	0.295*** (4.628)	0.566*** (3.818)	-2.116*** (-6.587)	0.713*** (4.684)
FDI	-2.955*** (-5.383)	5.637*** (5.589)	-2.935 (-1.169)	3.341*** (2.965)
Gov	0.092 (0.641)	-1.699*** (-6.910)	-2.007*** (-3.607)	-1.699*** (-6.337)
SCL	0.352*** (2.860)	-0.493** (-2.035)	-1.782*** (-3.111)	-0.292 (-1.141)
PoP	0.012 (1.101)	-0.006 (-0.354)	-0.019 (-0.418)	0.002 (0.0915)
Labor	-0.029* (-1.900)	-0.173*** (-6.187)	0.076 (0.980)	-0.192*** (-6.791)
常数项	0.862*** (5.390)	1.121*** (3.764)	4.326*** (6.806)	1.909*** (6.031)
样本数	330	330	330	330
R <sup>2</sup>	0.141	0.441	0.164	0.356
Code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F	14.86	39.43	11.23	23.70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水平。

表 10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2(创新)

变量	创新能力		研发投入	
	(1)	(2)	(3)	(4)
	Inv	Rich	RD	Rich
Inv		0.137*** (6.427)		
RD				0.082*** (3.903)
DT	3.886*** (12.140)	0.253 (1.435)	5.338*** (10.040)	0.347* (1.934)
FDI	0.287 (0.094)	3.401*** (3.373)	7.570*** (2.745)	2.819** (2.546)
Gov	-0.884 (-1.294)	-1.510*** (-6.096)	-0.728 (-1.479)	-1.571*** (-6.051)
SCL	3.049*** (4.587)	-0.649** (-2.556)	2.775*** (4.149)	-0.460* (-1.759)
PoP	0.344*** (6.679)	-0.045** (-2.384)	0.333*** (8.333)	-0.025 (-1.175)
Labor	0.521*** (6.261)	-0.266*** (-9.904)	-0.578*** (-5.736)	-0.147*** (-4.856)
常数项	2.219*** (2.704)	1.458*** (5.304)	2.430*** (3.409)	1.562*** (5.464)
样本数	330	330	330	330
R <sup>2</sup>	0.778	0.429	0.686	0.379
Code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F	302.30	37.95	101.00	24.43

注: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水平。

销售、在线服务、虚拟技术创新等形式,拓宽了创新渠道和方式。同时,数字贸易也为创新者提供了更多的观察和了解市场需求的机会,有助于更准确地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和服务。表 10 中列(3)、列(4)为研发投入的情况。由列(3)可知数字贸易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同时,由列(4)可知研发投入与共同富裕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数字贸易能够提升研发投入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综上,数字贸易为企业引进外部技术和创新提供了便利。通过数字平台,企业可以与全球范围内技术提供商和创新企业进行合作和交流,引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这种引进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思路、新的技术,并加速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提升。

## 6.2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采用陈爱珍和王闯<sup>[17]</sup>的区域样本分类法,将样本中的 30 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3 个地区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的省份划分如下: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等 11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湖北等 9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云南等 10 个省份。此划分来源于中国自 1986 年起对全国

地区的主要分类,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 11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 9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 10 个省份。

表 11 为地区划分的回归结果。东部地区数字贸易与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0.573,且在 1% 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数字贸易与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1.571,也在 1% 水平上显著;西部地区数字贸易与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相关性。综上可知在东中部地区能够实现数字贸易推动共同富裕,但在西部地区不明显,且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数字贸易推动共同富裕效果更加明显(1.571 与 0.573)。研究认为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可能更加中心化,具有更好的区位优势。这使得中部地区在数字贸易中能够更便捷地连接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市场和资源,从而增加了数字贸易的机会和交易量,进而推动了共同富裕效果。其次,中部地区在数字贸易发展方面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和重点推动,加大了政策扶持力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这使得中部地区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业务,提高了数字贸易的交易效率和规模,进而推动了共同富裕的实现。

表 11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东部地区 Rich	中部地区 Rich	西部地区 Rich
DT	0.573*** (2.740)	1.571** (2.117)	0.195 (0.367)
FDI	2.333 (1.466)	-2.713 (-0.742)	-4.702 (-1.413)
Gov	-1.878*** (-3.604)	1.436 (1.341)	-2.137*** (-6.405)
SCL	-0.613 (-1.433)	0.666 (1.571)	0.404 (0.913)
PoP	0.100** (2.610)	0.0324 (0.434)	-0.107*** (-3.055)
Labor	-0.160*** (-3.111)	-0.197 (-1.386)	-0.168*** (-2.641)
常数项	1.141* (1.931)	0.687 (0.677)	2.035*** (4.188)
样本数	121	88	110
R <sup>2</sup>	0.328	0.157	0.273
Code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F	8.518	2.264	7.683

注: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水平。

## 7 结论与建议

### 7.1 结论

(1)数字贸易对共同富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它有助于扩大和连接全球市场,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会。数字贸易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便捷的平台,打破了地域限制,使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市场。数字贸易的发展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2)数字贸易通过影响创业活跃度和失业状况,对共同富裕产生作用。它能够提高创业活跃度,为企业创新和发展提供更多机会。数字贸易还能够降低失业率,为失业人员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通过促进创业和降低失业率,数字贸易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3)数字贸易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对共同富裕产生积极影响。它为企业引入外部技术和创新提供了便利,加速了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提升。数字贸易也为企业提供更多观察和了解市场需求的机会,有助于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和服务。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数字贸易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4)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贸易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贸易促进了共同富裕的实现,但在西部地区作用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环境不同,导致数字贸易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差异。

### 7.2 建议

(1)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帮助居民就业。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政府应当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来支持数字贸易领域的创业项目,特别是对于那些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这样的财政支持将直接激发市场活力。同时,政府需要优化政策环境,简化创业相关的行政程序,降低创业门槛,为创业者提供一个更为便利和友好的营商环境。

(2)鼓励创新,多角度多方面服务企业。首先,政府需要对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加大投资力度,特别是在偏远地区,以确保所有地区都能无缝接入数字网络。同时,应当推动高速互联网服务的普及,为数字贸易和在线创新活动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撑。为了激发企业的创新潜能,政府可以提供

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增加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

(3)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施行不同的政策。对于中部地区,重点是加强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这涉及政府层面的增强支持,如提供财政资助、税收优惠等,以及加速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宽带网络和数据中心。

### 参考文献

- [1] 程恩富,刘伟.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剖析[C]//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第2辑,2012).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569-579.
- [2] 邱海平. 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途径[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7(4):21-26.
- [3] 黄承伟. 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及理论议题[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6):1-9.
- [4]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 [5] 温涛,王煜宇. 农业信贷、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C]//2005年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年会论文集. 重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408-427.
- [6] 贺雪峰. 农地抛荒与“新中农”崛起[J]. 决策,2013(7):18.
- [7] 叶兴庆. 改革创新乡村振兴财政支持投入机制[J]. 农村工作通讯,2018(22):50.
- [8] 宋晓玲. 陕南秦巴山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研究[J]. 时代经贸,2022,19(10):138-140.
- [9] 蓝庆新,窦凯. 美欧日数字贸易的内涵演变、发展趋势及中国策略[J]. 国际贸易,2019(6):48-54.
- [10] 马述忠,潘钢健. 从跨境电子商务到全球数字贸易: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下的再审视[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5):119-132,169.
- [11] 徐慧琳,杨望,谭小芬.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2023,39(19):5-10.
- [12] 韩亮亮,彭伊,孟庆娜.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软科学,2023,37(3):18-24.
- [13] 白俊红,张艺璇,卞元超. 创新驱动政策是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2022(6):61-78.
- [14] 周小虎. 中国创业竞争力发展报告(2018)[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
- [15] 温忠麟,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 [16] 肖梦瑶,韦琳. 数字化转型会抑制企业投资的“随波逐流”吗[J]. 现代经济探讨,2023(8):86-95.
- [17] 陈爱珍,王闯. 企业环境责任、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财务绩效[J]. 税务与经济,2023(4):82-89.

## Digital Trade and Common Prosperity: Evidence from Provincial Level

ZHAO Sanglin<sup>1</sup>, LI Zhetong<sup>2</sup>, DENG Hao<sup>1</sup>, ZHOU Zhiyuan<sup>3</sup>,  
YOU Xing<sup>4</sup>, TONG Jia'ang<sup>5,6</sup>

(1. School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 410205, China;

2.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 410205, China;

3.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Moscow 119991, Russia;

4.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 410205, China;

5.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6. CUHK Business School,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e rise of rural digital trade has accumulated rich previous experience, economic resources,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for 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which can effectively drive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promote the spontaneous growth of rural economy, and inject more innovative vitality into rural economy. Digital trade can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erms of channels, resources, and markets by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entrepreneurship channels, integrating urban and rural entrepreneurship resources, and opening up urban and rural entrepreneurship markets. Thereby, narrowing the wealth gap between small towns and rural areas.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role of digital trade in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in rural areas by improving relevant legal regulations, promoting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rural returnees, and encouraging cross 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among returnees, in order to better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digital trade;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a business;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economy